

人民大会堂

纪实

中

东S1B-4

44.654
SG
-3

人民大会堂 纪实

石 纲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人民大会堂 纪实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龙 文



第六章 大会堂大舞台

——样板戏出台内幕

- △从“鬼戏”说起
- △戏里戏外的沉浮
- △电影之外的人间活戏
- △“红灯”高照鞭炮响
- △周总理“说戏”
- △一“歌”激起千层浪
- △暮歌低吟

1965年5月的一天，雄伟、宏大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国的“第一夫人”正手舞足蹈的接见文化战线上一个特殊的剧组。

人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就是这次“不足为奇”的接见诞生出中国现代文化戏剧史上空前绝后的八大革命剧——样板戏。

那时的“第一夫人”只不过是文化部一个文化处长，主要是研究国内外的文化动态。对于一个演员出身的她来说，何以如此呼风唤雨，让整个中国成为她表演的舞台，使七亿人民成

为她疯狂的观众。这其中的奥秘，自不必说，但样板戏的起源，还得从1964年的文艺大会演说起……。

一、从“鬼戏”到样板戏

1964年，新中国度过了第二个七年。两年前还在欣赏传统京剧的江青，这时突然摇身一变，变得要“革命”了，要“革”传统戏的“命”。

这一年里，文艺界出现了奇特也耐人寻味的动态：一面，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另一面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严肃地批示道：“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作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的日期正逢会演期间。

1964年6月5日，是现代戏开幕的日子。周恩来、彭真、陆定一、茅盾、周扬等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会演规模可谓是阵势庞大，19个省、市、自治区，28个剧团参加了演出，送演剧目就达37台之多。以后被培植为“样板”的《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等，就是这次送演的优秀剧目。

江青那时在文化部任文化处长的职务，主要是研究国内外的文化动态。这对一个演员出身的人来说，似乎应该满足了。可是对于“第一夫人”江青来说，却远远不够，她感到委屈，感到压抑，活动舞台太小了，既不能风光地亮相（毛泽东不出国访问，她也不能出访），又无实质性的权力。素来爱争名好斗、表现自己的江青，她要扮就要扮“主角”，要争就要争“名角”！

1964年文艺大会演，正敲打在江青深感生命时间短暂和世界舞台无限的焦急心律上。她自然而然也理所当然地介入了进去。她的介入绝不是一般大摇大摆走进现场亮相，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她要介入就要完全彻底，像插旗子那样，一竿子到底，独树一帜。

她到会上，除了横挑鼻子竖挑眼外，就乱“开枪”，像一个不瞄准就扳机的盲动勇士，自以为可以大展身手，表现她出类拔萃的艺术水平和鉴别能力。

第一个撞她“枪口”的剧目是《红旗谱》，“红旗谱里的朱老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倾投降派，大肆渲染反革命气焰，降低革命的斗志。这戏能演吗？……像这样的戏再在舞台上演下去，势必要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文艺界基层的人一听，还真新鲜，颇有刺激。可是知情的人一听，江青讲这个话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早在两、三年前，报刊上就“有鬼无害”和“有鬼有害”，展开过热烈的争论。1961年8月廖沫沙用笔名“繁星”在

《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昆剧《李慧娘》借鬼魂抒发感情伸张正义的艺术表现手法。

《李慧娘》是由戏剧出版社的社长孟超执笔改编的，后来北方昆剧院将它搬上舞台。作者对作品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想“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主人”。可是他不知道，一场因他的作品而起的争论，正在酝酿、搅拌，像迅速发酵的面粉，已经散发出刺鼻的异味。他也不知道，化名为“繁星”的作者就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同志。他更不会想到，他的舞台“鬼戏”几乎就是一个新的人间“鬼戏”的预言。

廖沫沙的文章发表后，近两年的时间，报纸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热点争论趋势。突然在1963年5月，《文汇报》上发表批判文章《驳“有鬼无害”论》，这加了引号的字体，立即将戏剧界引进了一场“鬼戏”之争的迷魂阵里，众说纷纭，沸沸扬扬，直到1964年6月现代戏会演时，“鬼戏”还在争论不休。如果从当时争论的表现形式看，这“鬼戏”之争，是符合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因为一直限制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争论。

随着“鬼戏”争论的升级，人们开始敏觉地嗅闻风向，并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预感。

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几双居心叵测的眼睛注视下，终于在7月31日落下了帷幕。

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领导人，似乎比别人更多一点随风转舵的本领，他见江青插手这次会演，他的调子就必须以江青的调子为准。《李慧娘》他一直赞不绝口，在闭幕会上，他来

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赞扬到批判，而且言辞激烈，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调子定了，谁敢再调！周恩来也不能轻易去动，刘少奇本来就涉嫌“包庇”鬼戏，这次他也不能再像1961年时，力争使几部古典传统戏作为文化传统剧目保留下来。

因江青那时总是打着毛泽东的学生的旗号。再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人们崇敬、爱戴甚至迷信毛泽东，当然也不能也不敢忽视毛泽东的夫人，往往以为江青的话，某种程度就是毛泽东的意思。

“鬼戏”在舞台上消失了，可是一场罕见的人妖颠倒的大戏却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拉开了悲惨的一幕。

和“鬼戏”一起倒霉的还有许多优秀电影故事片。如《早春二月》、《红河激浪》、《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等十多部影片。

戏剧挨一重棒，电影受致命一击，那么，文艺界里另外一个领域，也是一个重头领域——文学呢？遭遇更惨！长篇小说《刘志丹》不仅被列为反党小说，而且还成立了专案小组，康生这位历史上擅长搞“专案”的人物，这次理所当然地当上了专案小组组长。随后，音乐、舞蹈、美术全有了各自的“帽子”，艺术家们也各自拖上独特且沉重的“尾巴”。在十年浩劫中，被愚昧、狂热的时代，打得“鼻青脸肿”，剥夺了做人尊严，丧失了青春年华，甚至失去了生命。酿成的潜在精神灾难，至今也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也是无法用文字消除的。

艺术被权术代替，文化被奴化取代！文化艺术界几经荡涤，几经横扫，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前，已经

趋于“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等到“文革”的疾风扫来时，文艺“百花园”迅速萧条，一派严寒的冬季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惨状。

在花飘叶落的萧萧园子里，只有京剧现代戏作为一种“文革”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代表着时代的某种轨迹，幸存地留了下来。可以说，“样板戏”和“文革”形影不离，相伴始终，长达十年之久。京剧如此长久兴盛并且与政治俱荣衰，恐怕独此一例。

虽然保留下来的京剧，已经扼掉了最初传统京剧的艺术内涵，变成了江青一伙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但是，它毕竟是1964年会演的优秀剧目，“样板戏”只是江青为它穿的外衣，而骨子里流动的是艺术的精髓。它在由盛到衰，由衰到盛，又由盛再到衰，多次被政治风云跌宕起伏后，许多唱词却经久不衰，直到今天在摇滚乐、流行乐充斥的舞台上，仍被很多年轻人理解和接受。

1964年京剧现代戏会演之后，江青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愁中拔了出来，迅速调整情绪，将会演的优秀剧目变成她培植的“样板”戏，这个计划不正是她“梦里寻她千百度”的“用武之地”吗？

江青从1955年到1962年的6年间，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其中有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医院养病。

身体如此糟糕，成了这般病恹恹的样子，她自己也很沮丧，情绪非常不稳定，时而高兴，时而悲伤。毛泽东和女儿都远离她的身边。作为女人，又是病人，特别需要丈夫的守护。可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她首先要服从的是国家利益

和党的需要，无论自己多么心烦意乱，都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可是江青不是善于处理这种情感的人。特别是在苏联养病的那个时期，时常感到孤独、寂寞，经常处在一种郁郁寡欢、被遏制的失落之中，致使好强的个性又蒙上了病态的色彩。

江青突然改变自己病态的性情，由被遏制、压抑的被动型转向“胜者为王”的挑战型。这一思维模式的变化，使得许多和她打过交道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叹：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江青，虽然有病，但是基本还能待人大度，给人以文质彬彬的感觉。可是“文革”一开始，她当上了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手里有了权，这下不得了了，下手整人狠着呢！

江青恢复了以往的自信，但是这个自信之下隐藏着她要出人头地的勃勃雄心。因为这之前，她知道中央有个培养自己民族的人才、专家和名人的计划。她为能成为这个计划里的一个角色，开始花费脑筋，如何才能寻找到通往“名人专家”的捷径？

中央之所以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太惨痛太深刻了。就培养专门人才问题，连续召开了好几次会议，积极培养和发现自己的名人专家，不能依赖外国专家和技术，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三年自然灾害把新中国推上了生死攸关的困难时期，天灾人祸像利剑悬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

先是北方干旱、南方水灾的天灾，后是苏联逼债的人祸。再加上三年“大跃进”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使中国经济命脉气血大亏，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这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只有拥有自

己的专家和技术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稳脚跟，不受欺负。中国要想成为东方巨人，还必须先成为经济巨人。

江青想当知名人士，这是她最初的动机。

1964年，也是在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夕，江青来到北京市委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江青到什么地方都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无官职，二无资历，不依靠毛主席的威望，是难以打开局面的，多少她还知道自己的分量！她先代表毛主席看望北京市委，转达毛主席对北京市委工作的满意，并希望市委领导再接再厉，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加出色。江青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说完，才开始谈她自己的想法：“我是搞文艺动态研究的，主席也很重视文艺工作。最近听说要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这很好嘛！这是一场京剧革命嘛，无产阶级的舞台怎么能让牛鬼蛇神统治呢，所以，我想就北京地区的京剧革命作调查研究，好向主席汇报哇。这也是北京市委的成绩嘛！”

江青这番话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视，立即布置落实这项工作。他们认为江青关心北京地区的京剧革命，立意也是为把北京的京剧搞上去，能在全国会演中一举夺魁。这是北京市委善意的理解。当市长也好，县长也好，哪个“父母”官，不指望上面能有人经常为他们出出面，撑撑腰，扶持一把？江青亲自出面，又是转达主席的问候，这是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北京市委理所当然要认真执行。

可是北京市委的理解和江青的想法却相差甚远。

江青选择了北京京剧一团作为京剧革命艺术实践的“样板田”。以为有了“田”，就可以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耕种”！

曾经参加“样板戏”创作的汪曾祺先生回忆说：江青抓戏，大都是从主题入手。“领导出思想”，江青除了定主题，定题材，还要规定一个粗略的故事轮廓。这种故事轮廓都是主观主义、凭空设想、毫无生活根据的。她原来抓了很长时间的《红岩》，后来又认为解放前夕四川党就烂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那时还有王明路线！”她随便一句话，四川党就惨惨惨了！她决定放弃《红岩》，另写一部戏，写：从军队上派一个女的政工干部到重庆，不通过地方党，通过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群众护厂，迎接解放。不通过地方党，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党的秘密工作有这么干的么？我和另一个编剧都没有这样的生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只好按她的意旨编造了一个提纲，向她汇报，她竟然很满意，那次率领我们到上海（江青那时在上海）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我们将提纲念给李琪听了，李琪冷笑着说：“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了？”

一味告虚构编织情节，苦心构思的剧本，因为没有生活，没有体验，也没有创作的基础，结果，她编的几个故事，既不符合历史背景，人物发展也不真实客观。本子无法编成剧，最后只好告吹。

失败后的江青一口咬定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有意和她过不去。

1966年5月1日，北京市市长彭真再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成为“文革”初期最早的沉沦者。宣传部长也随之被打倒，最后悲愤而死。

一年后，即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之际，首都召开了史无前例的纪念大会，到会的文艺战士就有一万六千多人。会议由江青主持，陈伯达作讲话。也就在同一天，样板戏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就是相伴“文革”始终、闻名遐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打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和这八个戏紧紧地连在一起，虽然剧本和舞台上，从头到尾也不见江青一横一撇，然而她对京剧革命的热点讲话和工作行踪不断地出现在报刊上，这比不署名的署名还要硬棒！

1968 年 9 月 5 日，随着我国最远的两个自治区——新疆和西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最混乱的武斗局面暂时打了个休止符。现在回顾十年动乱的历史，那才算度过了不堪回首的最初岁月，以后漫长的 8 年，狂热、混乱、无组织无纪律、没有法制没有民主像扭曲变形的社会“定律”，心安理得地统治着社会的大舞台，消融着人们短暂的生命。

1968 年底，只能说社会开始从狂热和混乱的巅峰，走向相对平缓的崎岖道路。造反派的“高烧”热度也稍稍降了些温。进入 1969 年，“文革”剑拔弩张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原来浓烈的武斗空气随着各级革委会的建立，慢慢趋于缓和。后来党组织恢复，形势更加好转。

无辜的百姓们总算可以喘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按部就班过日子时，突然发现，他们平时那种赖以寄托精神、滋补生活的文化环境不见了。每天带有文娱色彩的政治活动除了语录歌就是“忠”字舞。每当集会或是游行，甚至坐车的旅途，随时都

会来一段语录歌集体合唱和一场手擎红宝书的“忠”字舞。孩子们身段软，天性喜动，觉得又好玩又开心，最喜欢蹦跳。可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们就惨了，记不住动作，手脚硬棒得像木偶，一跳就引得四周人哄堂大笑，好端端充满造反激情的歌曲，被跳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可谁也不敢说三道四，尽管跳得极不美观，却仍是十二分地虔诚。因为这不完全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运动！

如果正在行进的列车上，每逢这个献“忠心”的时刻，那就更是妙不可言啦！车厢喇叭一响，旅客们不等红卫兵“列车员”督促，会自动地起身跳“忠”字舞，来自各地的人各有各的跳法，各有各的旋律，加上车厢小，颠簸，歌曲一响，人们哪里是在跳舞，活像在打群架！

没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大家开始讨厌这种滑稽的闹剧形式。这时，“样板戏”闯进了人们寂寞空虚的视觉里，尽管是现代革命戏，但毕竟是有民族色彩的传统艺术，也是国家的精萃。

空落多时的剧院，猛然爆满。北京城里的老戏迷们，原来是很挑剔的，没有名家名角压轴，还不大高兴去捧场呢！这时，他们也顾不得名家不名家，也不管有没有青旦、花旦、老生、武生的，这年头，能听到京韵大鼓、京剧京腔就非常不容易了。

北京市民非常非常容易知足！

剧院的繁荣景象，令江青兴奋，这是她梦寐以求的。

从开始培植“样板戏”，就有一帮人成为江青的忠实信徒，他们不断向她报告剧院爆满的喜讯。江青在高兴之后，开始冷

静思考，她觉得她义不容辞，应该采取新的行动缓解这个“看戏难”的矛盾。是不是叫样板戏“触电”？如果将样板戏变成电影艺术形式，无论从艺术作品的档次，还是影响范围，都是舞台无法比拟的。

1968年下半年，江青的重心开始往电影艺术上转移。江青好象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是怎样摧残践踏艺术界的？她指示上海有关部门负责拍摄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可是上海的文艺单位已经全面瘫痪，根本无法组织正常拍摄，勉强凑起来的班子，全是造反起家的角色，既不懂电影又不懂京剧，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吓得专业人员一个也不敢沾边。即使有人懂专业，也吃不透江青拍“样板戏”电影的意图。结果在上海整整折腾了一年，“样板戏”还不能改编成电影本子，更别说拍成电影了。

江青碰了壁才知道改编电影远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她的力量在上海还不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于是她将上海京剧团的演员拉到北京。一到北京，才知道她同样面临着“瘫痪机体”的困境。

她开始苦恼了，夜夜不能成眠。心情十分烦躁的时候，她就在钓鱼台 17 楼的放映厅看电影。有一段时间，那里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江青的身影，她一遍又一遍看京剧名家主演的戏剧电影，看一次急一次，那些名演员、名导演、名摄影能拍出艺术片，她江青为什么不能？骨腔子里的妒火和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劲，促使江青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艺术人才，比“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强！绝不能让他们东山再起，统治舞台。

江青这时突然想到了毛泽东，为什么早没有想起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威呢？如果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搬出丰泽园，住到位于中海畔的“游泳池”。江青在“文革”前就搬到钓鱼台宾馆居住，已经许多年和毛泽东分开居住了，但是他们有时还能正常往来，交谈，有时意见也能一致，虽然不像在延安时期亲密，也不及50年代融洽，但表面上还能说得过去。不像“文革”后期，毛泽东十分反感江青在政治局里拉帮结派，搞不团结的做法。1975年夏季，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江青和“四人帮”的错误行为，并且责成她写检查。最后几年，毛泽东很失望和伤心，几乎都不愿意见到江青。

江青知道毛泽东也喜欢听戏曲，京剧也是主席喜欢的一种。所以和毛泽东谈谈京剧革命什么的，还不至于招来反感。那时江青对京剧的喜爱几乎近于痴迷。

江青外出开会，车子里都备有中国京剧几大流派名家的唱片，她最欣赏谭派，喜爱谭元寿的唱腔。词正腔圆的京戏唱词，打发她路途的寂寞，她半闭眼睛，一边随车子轻轻晃动，一边有节奏地击打膝盖，完全一付京剧戏迷如痴如醉的模样。听到动情处，她还会热泪盈眶，微微叹息一番。

可是江青喜爱的是京剧的唱腔和韵味，而不是名家演员。曾经打动她情怀的京剧演员们，几乎没有不遭政治迫害的。名气越大名声就搞得越臭，挨整就越多。“文革”中，利用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待遇的不同，将“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和“高薪金、高稿酬、高奖金”享有“三名三高”待遇的名人

们，统统拉出来交给红卫兵批斗，让他们的艺术生命承受这来势凶猛的冲击，许多老艺人不堪凌辱，倒下去就再没有起来。

江青曾经义愤填膺地说过：“现在有的演员成了大资本家，每月工资 1700 元，银行存款 20 多万，周信芳比马连良还厉害，每月 2000 元，用着秘书、服务员，这还是劳动人民吗？地地道道的剥削阶级！”

她痛恨名家的存在和名气的影响，这可能和她 30 年代在上海电影界受名演员排挤算计有关系，所以一提名家就条件反射要反感。

可是名家倒了，江青的样板戏如何是好？

1969 年 5 月，8341 部队副政委狄福才从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左回到中南海，突然接到钓鱼台江青处的电话，说是江青找他立即就去。开始狄福才还以为他们搞错了人，江青不可能找他，她又不分管部队支左的事情。千真万确，江青就是找他！

1937 年狄福才还是个孩子，就参加了革命军队，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几乎都是在“警卫”的岗位上度过的。他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过保卫延安党中央的战斗。在杨家岭还为毛泽东站过岗。1949 年又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来到和平解放的北平。从走进紫禁城那天，他再没有离开过警卫工作这个岗位，1966 年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开始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领导工作。

“文革”一开始，又被派去工厂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直到他接到江青的电话……

“钓鱼台”宾馆是我们国家最早建造的国家级宾馆，专门接待外国元首的地方。这里不仅环境幽雅、宁静，充满了古典